

柏杨文集

丑陋的中国人

作者：柏扬

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。

多少年以来，我一直想写一本书，叫[丑陋的中国人]。我记得美国有一本「丑陋的美国人」，写出来之後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。日本人也写了一本[丑陋的日本人]，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阁下却被撤职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国比起日本，好像又差一级，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，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，所以我始终没有写。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，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，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。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，在台北，听我讲演的人，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。就立刻不请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[丑陋的中国人]讲演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

有一次，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，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，我问同学会会长：「会不会有问题？」他说：「怎麽会有问题？」我对他说：「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：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。又讲一个问题题目，那可是双料。」跟训导处谈过之後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：「问题是没的，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。」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。他问：「同意不同意？」我说：「当然不同意，不过你一定要改，只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「丑陋的中国人」。我对他说：「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，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诺。结果讲过之後，把录音带寄来，只有开头的几句话，以後就没有了声音。

今年我六十五岁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。我对他们说：「我活了六十五岁，全是艰难的岁月。」我的意思是：不仅仅我个人艰难，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。

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，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，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，同你们谈「艰难」，你们既不爱听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谈的艰难，不是个人问题，也不是政治问题，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。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，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。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。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，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，永远无尽无期。

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，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，我们所讲的「中国人」不是国籍的意思，而是指血统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，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，到了那裏几天之後，不能忍受，哭着回来。她说：「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。」後来我到了泰国。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。好比说：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。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，假使你的衣服破了，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，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，这就是商业行为，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，走到裁判所，问她：「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？」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，只有一个感慨「中国人造了什么孽？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？前年，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，看

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，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，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，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，我们觉得很亲切，问她「你怎麼会讲中国话？」她说：「我是中国人，从越南逃出来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，一面说，一面呜咽。我只好安慰她：「至少现在还好，没有挨饿。」在告辞转身时，听到她叹了一口气「唉！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！」我对这一声叹息，一生不忘。

十九世纪的南洋岛，就是现在的东南亚，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。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：「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。」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，无知无识，自生自灭，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。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。灾难更大。最使我们痛苦的是：一百年来，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。几乎全部归於幻灭。来了一个盼望，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，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，反而更坏。再来一个盼望，而又是一个幻灭，又是一个失望。又是一个更坏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长长远的，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，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，经得起破灭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，还是不光明的？真是一首难尽。四年前，我在纽约讲演，讲到感慨的地方，一个人站起来说：「你从台湾来。应该告诉我们希望，应该鼓舞我们民心。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。」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。问题是，鼓励起来之後怎麼办，我从小就受到鼓励。五、六岁的时候，大人就对我说：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」我想我的责任太大，负担不起。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：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」现在，儿子又告诉孙子：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」一代复一代，一代何其多？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？

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，「反右」之後接着又来一个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翻地覆，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麼大的一场人造浩劫。不仅是生命的损失，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。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，就跟禽兽毫无区别。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。这样一个民族：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，怎麼能够站得起来？在马来西亚，华人占百分之三十三，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，裏面有马来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没有华文。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，没有华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现象一方面说，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受到尊重。泰国的华人说：「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个法令下来。你什麼都没有了。

现在，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，任何一个国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。都是一种羞耻。

等到收复它的时候，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，同到母亲的怀抱。双方都非常欢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、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，当它们丧失的时候，是多麼痛苦，它们回归的时候，又是多麼快乐。可是我们的香港，一听说要回归祖国，立刻吓得魂飞魄散。这是怎麼一回事？至於我们在台湾，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，主张台湾独立。想当年。三十年前，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，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。三十年之後。为什麼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？赛普路斯，一边是土耳其人，一边是希腊人。根本是两码子事；言语不一样，种族不一样，宗教不一样，什麼都不一样，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。而我们，同一个血统，同一个长相，同一个祖先，同一种文化，同一种文字，同一种

语言，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，怎麼会有这种现象？

这种种事情，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，不但艰难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，你不晓得他是怎麼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独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

简直没有共同语言。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，这算是一个什麼样的民族？这算是一个什麼样的国家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麼历史悠久，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，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。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，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，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。为什麼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国人欺负，更受自己人欺负--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负。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。看到外国小孩，他们是那麼快乐，我从内心产生羡慕。他们没有负担，他们的前途坦荡，心理健康，充满欢愉。我们台湾的孩子，到学校去念书。戴上近视眼镜。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，六亲不认。他母亲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。母亲悲怆的喊：「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麼？你用功罢，你用功罢！」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，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，学生马上就抗议：「我们不要学做人，我们要学应付考试。」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，从小就要斗，就要诈欺，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，就要满口谎言。多可怕的教育，我们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。

我在台湾三十多年，写小说十年，写杂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为什麼我不写小说了？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，要透过一个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写杂文。杂文像匕首一样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。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，你已经开错了，应该左转，应该右转，应该靠边走，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，前面有桥，应该放缓油门，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，有红灯等等。不停的提醒，不停的叫，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。掌握权柄的人认为：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就永远没有错误。

我自己在牢房裏沉思，我为什麼坐牢，我犯了什麼罪？犯了什麼法？出狱之後，我更不断的探讨，像我这样的遭遇，是不是一个变态的、特殊的例子？我到爱荷华，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发现，像我这种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湾坐牢，就在大陆坐牢。

他们同我讲：「你这个脾气，到不了红卫兵，到不了文化大革命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为什麼一个中国人，稍微胆大心粗一点，稍微讲一点点实话，就要遭到这种命运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，我问他们：「你为什麼坐牢？」他们说：「讲了几句实话。」就是这样。为什麼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？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。前几天，有位从北京来的「全国作家协会」的党书记，我同他谈，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。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，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。但不能怪他，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，都不能责备，换了各位，在那个环境之中，纳入那种轨道之後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，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。我也会那样做。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，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。常听到有人说：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裏。」我年纪大了之後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，事实上是，一半操在自己之手，一半操在别人之手。

一个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搅拌机裏的石子一样，运转起来之後，

身不由主。使我们感觉到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。耶稣临死的时候说：「宽容他们，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」年轻时候读这句话，觉得稀松平常，长大之後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才发现这句话多麼深奥，多麼痛心。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们的丑陋，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。我到爱荷华，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，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，再出私人捐助一半。

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，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，我们从前没见过面，捐了一个这麼大的数目，使我感动。他和我谈话，他说：「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书之後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，所以说，我想请你当面指教。」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，我第一次出国时，孙观汉先生跟我讲：「你回国之後，不准讲一句话：唉！中国人到那裏都是中国人。」我说：「好，我不讲。」回国之後，他问我：「你讲得怎麽样？」我说：「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：中国人到那裏都是中国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。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後，有所改变，想不到并没有变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？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，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？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，这不是自找安慰，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，往往是中国人，许多大科学家，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，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头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，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，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？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後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。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，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？什麽原因？
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，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说：「自己不争气，却怪祖先。」这话有一个大漏洞。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（按，[本鬼]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出个梅毒的儿子，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：都要吃药。有一次，儿子愤怒的说：「我不要这个药，我宁愿死。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？」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。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，假定我们要怪的话，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？这麼一个庞大的国度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，却陷入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难以自拔。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心裏充满了羡慕。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。产生了现在这样的现象，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多种可怕的特徵。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、乱、吵。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。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我们的厨房脏乱。我们的家庭脏乱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国人一去，别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个小朋友，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，嫁给一个法国人，住在巴黎，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，打过地铺。她跟我说：「她住的那栋楼裏，法国人都搬走了，东方人都搬来了。」（东方人的意思，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，有时候专指中国人。）我听了很难过，可是随便看看，到处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；小孩子到处跑，到处乱画，空气裏有潮湿的霉味。我问：「你们不能

弄乾淨嗎？」她說：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，我們亂。經過這麽樣提醒之後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、我們亂。至於吵，中國人的嗓門之大，真是天下無雙，尤以廣東鄉土的嗓門最為叫座。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：兩個廣東人在那裏講悄悄話，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，急撥電話報案，警察來了，問他們在幹什麼？他們說：「我們正耳語。」

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？因為沒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，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：只要聲音大、嗓門高，理都跑到我這裏來了，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麽氣憤？我想這几点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，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。因為吵、髒、亂，自然會影響內心，窗明几淨和又髒又亂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至於中國人的窩裏鬥，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個單獨的口本人。看起來都像一條豬，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：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。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個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國人做生意，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，你賣五十。我賣四十，你賣三十，我賣二十。所以說。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，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，下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里，在考場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。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，三巨條龍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條豬、一條蟲，甚至連虱都不如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，中國人永遠不團結，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，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，我只好說：「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，團結起來，萬眾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憐你們，才教中國人不團結。」我一面講，一面痛徹心腑。

中國人不但團結，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。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個華人社會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。中國有一句話：一個和尚擔水吃，兩個和尚抬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？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說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）來美國，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裏，談得頭頭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麼樣救國等等，第二天我說：「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。」他一听是張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說：「你送我去一下吧！」他說：「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國學校教書，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還講什麼理性？所以中國人的窩裏鬥，是一項嚴重的特徵。

各位在美國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，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

凡是出卖中国人的：也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凡是陷害中国人的，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严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，一块从中国来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质问他怎麼做出这种下流的事？那人说：「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，你现在高楼大厦，我现在搞的没办法，我不告你告谁？」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。譬如说，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，沧海一粟。怎麼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麼！誰

告你？就是你身边的朋友，就是中国人告你。有许多朋友同我说：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，你可要特别注意。特别小心，他不但不会提升你，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。因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无私，所以我们怎麼能跟犹太人比？我常听人说：「我们同犹太人一样，那麽勤劳。」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，一个是，中国人的勤劳美德，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。几千年下来，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--勤劳，现在已不存在。第二，我们拿什麼来跟犹太人比？像报纸上说的：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，不得了啦，三个人有三个意见。但是，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，一旦决定了之後，却是一个方向，虽然吵得一塌糊涂，外面还在打仗，敌人四面包围。仍照旧举行选举！各位都现白，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，没有反对党的选举，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。在我们中国，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，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。却是三个方向。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，有人提议到旧金山，表决决定到纽约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会去纽约。如果是中国人，哼，你们去纽约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还是去旧金山。我在英国影片中，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，有的要爬树，有的要游泳，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，表决通过爬树，於是大家都去爬树。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：投票的时候，大官还要照个相，表示他降贵纓尊，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
中国人的不能团结，中国人的窝里斗，是中国人的劣根性。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，而是中国的文化中，有滤过性的病毒，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，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，明知道这是窝里斗，还是要窝里斗。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，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。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，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。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？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：「这件事我错了。」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。我女儿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结果是我错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厉害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，她只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一翻脸，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来，我说：「对不起，爸爸错了，爸爸错了，我保证以後不再犯，好女儿，原谅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後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，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。

中国人不习惯认错，反而有一万个理由。掩盖自己的错误。有一句俗话：「闭门思过。」思谁的过？思对方的过？我教书的时候，学生写周记，检讨一周的行为，检讨的结果是：「今天我被某某骗了，骗我的那个人，我对他这麽好，那麽好，只因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对方的检讨，也是说他太忠厚。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？那麽谁不忠厚呢？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。我们虽然不认错，错还是存在，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。为了掩饰一个错，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，再制造更多的错，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。所以说，中国人喜欢讲大话。喜欢讲空话，喜欢讲假话，喜欢讲谎话，更喜欢讲毒话--要毒的话。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，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。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，全都是大话、空话。我不再举假话、谎话的例子，但中国人的毒话，却十分突出，连闺房之内，都跟外国人不同。外国夫妻呢称「蜜糖」「打铃」，中国人却冒出：「杀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，毒话就更无限上纲，使人

觉得中国人为什麼这麼恶毒、下流？

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，後來改行做生意，有次碰到他，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？他说：「发什麼财？现在就要上吊！」我问他为什麼赔了？他说：「你不晓得，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讲了半天，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。」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：「和中国人交往很难，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裏什麼想法。」我说：「这有什麼稀奇，不要说你们洋人，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，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颜观色，转弯抹角，问他说：「吃过饭没有？」他说：「吃了」其实没有吃，肚子还在叫。譬如说选举，洋人的作风是：「我觉得我合适，请大家选我。」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：即令人请他，他也一再推辞：「唉！我不行啊！我那里够资格？」其实你不请他的话，他恨你一辈子。好比这次请我讲演，我说：「不行吧！我不善於讲话呀！」可是真不请我的话，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，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。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，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，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。
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，跑来看我，他说：「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。」我说：「对不起，我还有约。」他说：「不行，一定要来！」我说：「好吧，到时候再说。」他说：「一定来，再见！」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，可是洋人不明白。办完事之後？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说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国教授说：「哎！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？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说：「哪有这回事？」他说：「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。

这种种情形，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辈朋友，还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有权势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钱，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些都是精神浪费。所以说，有句俗语：「在中国做事容易，做人难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软体文化，各位在国外住久了，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难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为你讲了实话，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？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，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中打转。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，开任何会议时，我都可以坐在那裏睡觉，睡醒一觉之後，会也就结束。为什麼呢？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听不听都一样。不只台湾如此，大陆尤其严重。今年（一九八四）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，写了一篇小说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荐给各位，务请拜读。环境使我们说谎，使我们不能诚实。我们至少应该觉得，坏事是一件坏事，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，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，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。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，不是不光荣的事，甚至是光荣的事，这就造成一个危机，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。

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，不断的讲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，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，不能开阔。中国的面积这麼大，文化这麼久远，泱泱大国，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麼样的心胸？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。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？只要瞪他一眼，马上动刀子。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，中国人打一架可是

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！为什麼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
没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，不够平衡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。自卑的时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时候，成了主人！独独的，没有自尊。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，和权势走得越近，脸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顾。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。

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，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，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。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，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。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会走了，因为他开始发烧。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。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，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；这些都是自我膨胀。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，车掌小姐说：「我们这位司机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机，英俊、年轻。」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，向大家拱手致意。这就是自我膨胀，他认为他技术高明，使他虽不扶方向盘，照样可以开车。若干年前，看过一部电影。有一次，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，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，当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给大家看，全场掌声雷动。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，觉得伟大起来，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，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说：「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，你怎麼可以这个样子？」他说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後，把盖子一盖，伟大加三级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声就没有了。观众大发脾气：我们出钱是看飞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飞。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：「你膨胀的结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
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，为什麼容易膨胀？因为中国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见识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点气候，就认为天地虽大，已装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。还没有关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数，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。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，死不认错。可是又不断有错，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：台北有个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诊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给救活了。两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，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，就跟医生去讲，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。说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，现在要转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说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几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，既悲又愤，我向他说：「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写文章揭发他。」他大吃一惊说：「你这个人太冲动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讲。」我听了气得发疯，我说：「你怕什麼？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，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？再说，他如果要对付的话，也只能对付我，不会对付你。是我写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说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，不愿意我去闯祸。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，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。

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，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，是一个中国人被抢，捉到强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认。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。不晓得什麼是自己的

权利，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，总是一句话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个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，使我们民族的元气，受到挫伤。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个暴君，对这样一个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，真是天理不容。这种神经质的恐惧，是培养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温床，所以中国的暴君、暴官，永远不会绝迹。中国传统文化里--各位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欢，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。

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是最灿烂的时代。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东汉，政府有个规定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、辩论、写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，这叫做「师承」。如果超出师承，不但学说不能成立，而且还违犯法条。这样下来之後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杀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，滴水不进。一位朋友说，「怎麼没有思考力？我看报还会发牢骚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仅有一面，不仅有两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，说它是个白球。另一边的人，则说它是个黑球，他们都没有错，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，而跑到另一边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当我们思考问题时，应该是多方面的。

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，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，给学生一个气压计，叫他用「气压计」量出楼房的高度，意思当然是指用「气压」测量高度。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气压」，老师很生气，就给他不及格，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，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麼要那麼回答？他说：「老师要我用那个「气压计」来量楼有多高。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「气压」，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。」委员会的人问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学生：「还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，再量绳子，就知道楼有多高。」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」学生说：「还有，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，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，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。」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，他所显示的意义，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浆糊脑筋吓死。

还有一种「买西瓜学」，老板对伙计说：「你一出门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桥那里，就有卖西瓜的，你给我买两斤西瓜。」伙计一出门。往西走，没有看见桥，也没有卖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来。老板骂他混蛋，没有头脑。他说：「东边有卖的。」老板问他：「你为什麼不到东边去？」他说：「你没叫我去。」老板又骂他混蛋。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，服从性强，没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计出去一看，西边没有，东边有。就去买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：「你太聪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应该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，会胡思乱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，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。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，怎能独立思考？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，也恐惧独立思考。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

没有是非，没有标准。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
这个文化，自从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间，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，所有认识字的人，都在那裏注解孔丘的学说，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，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，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，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

存。这个潭，这个死水，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，酱缸发臭，使中国人变得丑陋。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，以至许多问题，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，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。这样的死水，这样的酱缸，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。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，别人有民主，我们也有民主，我们的民主是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别人有法制，我们也有法制，别人有自由，我们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马线，我也有斑马线-当然，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。

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，只有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。我们虽然不会演戏。却要会看戏，不会看戏的看热闹，会看戏的看门道。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，他当场拒绝，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，并不一样。我听了很惭愧，他就是一个鉴赏家。

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，从不揭露对方隐私，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，丧失选票。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，不但专门揭露隐私，而且制造隐私，用语恶毒。什麼样的土壤长什麼样的草，什麼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麼样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，还去怪谁？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。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？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选民在排着队选举，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，有人就问：「怎麼不给我呀？」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，不能靠别人赏赐。现在，常有人讲：「政府放宽多了。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权利是我们的，你付给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给我，我也有。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，就一定要争取选举。严格选择对象。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，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。能够怪谁？好比说画画，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，有人看到说：「这真好！」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，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没有鉴赏能力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。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：假画出笼，真画家只好饿死。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，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。结果把门装颠倒了，主人说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缝师傅说：「谁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错人！」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。

没有鉴赏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
中国人有这麼多丑陋面，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。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，不是经济帮助，而是文化帮助。因为中国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。在座的美国朋友，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。最後一点，我的感想是：我们中国人口太多，仅只十亿张大的口，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，使我们想到，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，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，我们就能鉴赏自己，鉴赏朋友，鉴赏国家领导人物。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条路。

谢谢！

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；十二月一日纽约《台湾与世界杂志》；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报》；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《论坛报》。

酱缸国医生和病人(代序)

作者：柏扬

话说，从前，有个酱缸国，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。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，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，大概情形是这样的：

病人：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大摆筵席，你可要赏光驾临，作我的上宾。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？

医生：对不起...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：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，恐怕是三期肺病：第一个是咳嗽.....

病人：怪了，你说我咳嗽：你刚才还不是咳嗽，为什麼不是肺病？

医生：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。

病人：有什麼不一样？你有钱、有学问，上过大学堂，喝过亚马逊河的水，血统高人一等，是不是？

医生：不能这麼说，还有半夜发烧.....

病人：不能这麼说，要怎麼说才能称你的心、如你的意？半夜发烧，我家那个电扇，用到半夜把手烫出泡，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！

医生（委屈解释）：吐血也是症候之一。

病人：我家隔壁是个牙医，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，难道他们也得了三期肺病！

岳生：那当然不是，而是综合起来.....

病人：好吧，退一万步说，即令是肺病，又是七八期肺病，又有什麼关系？值得你大呼小叫！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？为什麼你单指着鼻子说我。我下个月结婚，谁不知道，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，为什麼要打击我？我跟你有什么怨？有什么仇？你要拆散我们？

医生：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只是说.....

病人：我一点也不误会，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，你幼年丧母，没有家庭温暖，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，生了大牢，对公平的法律制裁，充满了仇恨，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，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。

医生：我们应该就事论事.....

病人：我正是在就事论事，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，是怎麼下得手的，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。

医士（有点恐慌）：诊断书根据你血液、唾液的化验，我不是平空说话。

病人：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，就等於你当初的刀子，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。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，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，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，你不觉得可耻？

医生：老哥，我只是爱你，希望你早日康复，才直言提醒，并没有恶意。

病人（冷笑兼咳嗽）：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，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，阻止你在「爱」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。

医生：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，像唾液，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……

病人：崇洋媚外、崇洋媚外，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、贱骨头，我严肃的警告你，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。

医生（胆大起来）：不要乱扯、不要躲避，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，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麼关系？我们的主题是：「你有没有肺病」？

病人：看你这个「丑陋的中国人」模样，嗓门这麼大，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，怎麼说没有关系？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，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，因而看不起我们。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，天理不容，锦衣卫（努力咳嗽），拿下！

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（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），有时候是乱棒打出，有时候是口诛笔伐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，台北

骂

作者：柏扬

中国文字中最无法下界说的，莫过于「骂」，骂本来的意义应该是一种侮辱，你阁下骂了柏杨先生一顿，我准跳高。而柏杨先生骂了你阁下一顿，你也不会放过我，准回敬曰：「干你娘」。不特此也，叁国时，代诸葛亮先生在两军阵前，碰见王朗先生，几句「皓首匹夫，苍髯老贼」，王朗先生一听，大叫一声，活活撞死马下，这真是恒古之大骂。不过，骂之为物，用之於廉耻未泯的朋友，其效尚宏，这年头王朗先生者流不多，多的是正人君子 and 道貌岸然。诸葛亮先生如困生到现在，骂了半天，别人无事，照漾嘻嘻笑而笑嘻嘻，他自己死怕反而会大叫一声，活活撞死马下也。

主要的是，「骂」一入官场，其意义即大变特变。柏杨先生在官惠大学堂担任教习，教的就是「挨骂学」，对此有精辟的阐扬，有志之士，可往旁听。夫「挨骂为升官之本」，有些人想挨骂还不可得。盖你收了红包的结果，如果不是挨骂，而是法律裁判，就一切都完了蛋矣。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曰：「打是亲，骂是恩」，指父母对子女而，言而能给你官做的人就是父母，被人给官做的就是儿子孙子重孙子。君读明史，读到明末种种镜头，一定拍案叫绝。魏忠贤先生不过一个被阉割了的地痞，可是因他可以给人官做，中央文武百官以及地方文武百官，几乎全都拜在他的脚下当乾儿子乾孙子乾从孙子，挤不到子孙圈里的官，便如丧考妣，以头碰墙，恨不得吃两斤巴松。既有如此跳圈之狂热，则像二「章」先生那种操他的妈，或罚他的跪，不但不是侮辱，简直是一种异数。有些人在子孙圈之外徘徊流涕，想自己的妈被操，想跪上一年半载，还没有人肯下手哩。

时代进步，骂也跟着进步，操妈罚跪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内容遂变得十分复杂。有那麽一天，我在街上过见一个场面，两位都是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的人物，无眼镜的问曰：「老板叫你去干啥？」戴眼镜的答曰：「挨了一顿骂，惨啦，惨啦。」我当时就告老妻曰：「记住那家伙，他马上就要升官。」老妻

不信曰：「挨骂的人还能升官？你真老糊涂。」愚妇之见，真是可叹。果然，前天翻报，升官图中有他的玉照。

盖挨骂学的精华全在於，此那就是说，老板大人呀，请瞧请瞧，你操我妈也，罚我跪也好，我仍然狂热的爱你忠，你不给我官做，你狗崽的还有天良乎？而老板大人也是如此想法，我操他妈，罚他跪，他都不变，安全可靠，莫此为甚，我不给官，给王八蛋官乎。壮哉，一到末世，就安第一。古书上可惜没有写出顶撞李鸿章先生那位知府的姓名，否则我敢打包票，他准没有前途。想当官的朋友必须把握此项秘诀，第一步是先往子圈里跳，第二步是取得挨骂格，第三步是使老板自觉他是黄天霸，第四步是「挨骂学」、「买西瓜学」、「难得糊涂学」、「一脸忠贞学」出笼。包管你明天就坐在大办公桌之，向周弃子先生埋怨曰：「这局长真不是人干的。」你敢跟我赌一块钱哉？

一个人甘心当奴才，甘心被骂，是他真的「忠贞在此，诸神退位」乎？当然也有一种祖传的奴才胚，以当奴才为荣的，不过恐怕是大多数都另有天地。不管你怎麼整我，只要能给我官做，我就兴兴头头，前仰後合。於是，所有的看家本领，就在这种情势下，五光十色，大批出击。有些人一看小官崽大衣而车门，就大叫不得了啦，不知道在暗室之中，小电影的节目还更为精彩，这是时代的需要，无可奈何者也。有一个问题在焉，有心的人不妨四打听，在中国历史书上，几乎到都有责备别人「忘恩负义」的宣言，不外是某人焉，原来没饭吃，要不是我拉他一把，早饿死啦，可是他忘恩负义，骂他两句竟不肯接受，某人焉，原来当课的，我连升他八级，教他当处长，可是他忘恩负，竟不跳楼。呜呼，只要随便走走，所碰见的，简直全是这种有於人的人，而所感叹的，又无不是别人如何如何的忘恩负义。人听啦，好像中华民族忘恩负义的风气特盛，真是毛骨悚然。

幸而事实上颇有研究馀地，人是有权力欲的，罗素先生有一本巨「权力论」，认为权力是人类进化的动力，和唯物论，唯心论，鼎立而成为第叁种学说。所以人们对权力的来源，无不诚惶诚恐。该来源如果是选民，则他忠选民。该来源如果是君主，则他忠君主。该来源如果是柏杨生，他忠柏杨先生。该来源如果是官崽二抓牌，则他效忠官崽二抓牌。这里面最大的分野是，效忠於选民，他可以维持他人性的尊严。如果效忠於杨先生，我既操他妈又罚他跪，必要时还要他闻屁粪，他的自尊心恐怕很难维持。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，要想他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一样，倔强不变，可乎？在另一方面，使人最大的困惑是，明明用的是奴才，异想天开，希望该奴才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。从前对人，以国土待之，则国土报之。而今对人，以奴才待之，希冀以国土报之。用玩奴才的手段去结死党，怎不到处喊人心不古哉？一个月几百几千薪金雇别人的劳力，到时候要他从十八层楼往下跳，不跳就是忘恩负义，如果颠倒过来，老板大人阁下自己往下跳乎？即令有格外的施恩，已用格外的谄媚报答之矣。人的性格是一贯的，他为啥向你低头？为啥你操他妈罚他跪他还满面红光？是因为你给他官做，一旦你稀里花拉，不能给他官做啦，再想如法炮制，自然不接受，盖他去找别的能给他官做的人啦。这个道理，比柏杨先生张口向你阁下借一块钱，都明白，没啥好商量的也。

中国知识份子走的路，两千年来，都是固定了的，咬定一个主子，吃人一碗赏下来的饭，不但没有第二路可走，而且除了这一条路外，想活下去都有点困难。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「人生以做官为目的」的地下哲学，一切

为主子服务矣。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，应推叔孙通先生，研究他一生的奇遇，可看出中国六化所缺少的灵性到底哪里去啦。他阁下原来是秦王朝的「待诏博士」，陈胜先生揭竿叛变後，消息传到咸阳，二世皇帝嬴胡亥先生表示民主，特向大家征求意见，诸生参十余人说老实话曰：「人臣无将，将则反，罪死无赦，愿陛下发兵击之。」嬴胡亥先生一听，勃然大怒，叔孙通先生瞧在眼里，一脸忠贞学出笼，急忙奏曰：「诸生解皆非，夫天下一家，毁郡县城，铄其兵，视天下弗复用，且明主在上，[柏杨先生按：这一巴掌拍的结实]，法於下，吏人秦职，四方辐辏，安有反者？此特群盗鼠窃，何足置齿牙哉。邵守尉令捕诛，何足忧。」嬴胡亥先生是一个短命鬼，当皇帝不到叁年，就被子孙圈中坚份子赵高先生一刀，戳穿尊肚。满朝文武似乎只有叔孙通先生摸了个准，盖昏庸骄横的家伙，最大的特徵是喜欢听顺耳的话。诸生们老老实实说真话，嬴胡亥先生当然大怒，「这种地头蛇头目，中国多的很，莘莘大者，又有二人焉，杨广先生和朱由检先生是也」，叔孙通先生信口雌黄了一顿，就立刻浑身舒服。史书上说，嬴先生马上就赏了他二十匹西服料，一件大衣，另外，升他为正式「博士」。

叔孙通先生回到家里，那些大败的人心里不服，找他理论，问曰：「陈胜明明是叛变，你为啥说了一大堆，不嫌谄媚得过火呀？」请看他阁下如何应对，答曰：「你们不知我也，我不把他弄得晕晕忽忽，而像你们一样，也说真话，咱们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回家哉？」这是一个千古不灭的镜头，上下交相骗，而国砸矣。嗟夫，我们能责备叔孙通先生骗乎？地头蛇一手拿着皮鞭，一手拿着「帛二十匹」、「拜为博士」，威迫利诱，逼你非骗不可。换了柏杨先生，左一思，右一想，恐怕说出来的话，比叔孙通先生还要使他阁下过瘾。但叔孙通先生高明的地方是，他在升官发财之後，并没有鬼迷心窍，沾沾自喜，看准了秦王朝马上就要打烊，乃卷起行李，逃之夭夭，投奔别的主子去啦。大概他的霉气未退，所投奔的对象，一个个也跟着打烊。先投奔薛，薛已降楚，再投奔楚，楚又灭亡。辗转了若干年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最後归汉，刘邦先生瞧他穿着儒生衣服，又宽又大，幌来幌去，简直从心眼里讨厌。叔孙通先生何等聪明，就立刻改装，短衣短裤。

叔孙通先生跑来跑去，并不是孤伶伶的跑，而是有一群学生以他为首的子孙圈，在他的屁股後，跟着跑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刘邦先生给老师一个官做，以便吃菜的菜，喝汤的喝汤。可是想不到叔孙通先生不但不向刘邦先推荐他们，反而把些叁竿子打不着的强盗匪徒之类，硬往里拉，於是学生全体哗然，且看史书上如何写吧，汉书云：「通[叔孙通]之降汉，从弟子百余人，然无所进，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。弟子皆曰：事先生数年，幸得从降汉，今不进臣等，专言大猾，何也。」大猾者，知识份子瞧不起粗线条，口头上占便宜的话也。叔孙通先生解释曰：「刘邦现在拼命打天下，你们能斗一下？当然先推荐泼皮亡命之辈。各位同志且稍安勿躁，我忘不了你们。」果然，刘邦先生拳打脚踢，搞出了一个王朝，当了皇帝。而皇帝也好，大臣也好，将军也好，当初大家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，不分彼此，咬耳朵摸屁股的朋友，天下是大家打下的，要高兴当然一齐高兴，「群臣饮宴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，」把刘邦先生搞得焦头烂额。叔孙通先生抓住机会，建议「共起朝仪」，共起朝仪的结果是刘邦先生大悦，曰：「俺今天才知道当皇帝之妙也。」於是，叔孙通先生趁着主子大悦之际，缘竿而上，把他的学生荐了上去，刘邦先生乃一一发表他们为「郎」，「类似现在次长、司长、科长之

类的官」。叔孙通先生也真会做人，刘邦先生不是赏了他五百斤黄金乎？他也转送给学生，学生欢呼雷动，赞曰：「叔孙先生真是圣人，知当世务。」

我想读者先生现在可以了解「圣人」的定义矣，圣人者，「知当世务」，能弄到官做，也能给人官做之人也。社会上很多奇异的事情，便由此发生，在洋大人之国，不学一定无术，而在我们中国，不学硬是有术，谁使他有术乎？官使他有术也。那也就是说，官就是圣人，官大啦，道德学问也跟着。大有很多场合，大官崽端着嘴脸，猛训小官崽曰：「你看的只是局部现象，而我看的是全局，我必须考虑到全局。」直把小官崽训的张口结舌。其实他懂得啥叫全局？他如果有眼光看全局，早买麻绳上吊矣。他的哲学根据就是官大学问，大盖远在两千年之前，叔孙通先生起，圣人就和官崽结合，化而为一，弄得既官且圣，既圣又官。一旦柏杨先生的洋女婿，[按：柏杨先生令媛於前年和美国一位擦皮鞋的纽约隆重结婚，好不可羨。读者先生不必送礼啦，原地肃立致敬即可啦]，只要由他向当朝一品提一提他岳父如何如何，依目前风气，凡洋大人一提的，无不身价十倍，则我当个地震局局长，准不成问题。走马上任之後，用不了叁天，我就是地震专家矣。盖只有手中有权，便是圣人，说啥都懂，训起人来，头头是道。

叔孙通先生最大的功劳是代编字典的「圣人」定义，要想当圣人，非有权给人官做不可。有权给人官做，才能攻训词而勉後进，否则便不值一文也，不要说社会上啦，就是在至高的大学堂里，年头也有不对，柏杨先生想当年念书时，对教习们由内心发出敬意，老师布鞋长发，棉袍上都是补钉，敬意反而更增。现在恐怕不太简单，一个有权给学生官做，或有力把学生弄出国的教习，才有份量。别瞧把孔丘先生恭敬的昏头转向，那是孔丘先生死啦，如果他阁下还活着，去国立台湾大学当教书试试，恐怕没有人听他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那一套。

除了为「圣人」下定义外，叔孙通先生还作了一件启示，那就是老板大人和子孙圈的关系，在於能不能给他们好处，诸生追随叔孙通先生东跑西跑，总算死心塌地矣，书上虽没有详加描写，但主奴间的感人事，一定很多很多。可是逐渐的他们不耐起来，来了个窝里反，群起而向老师提出质问。幸亏老师身怀绝技，不负众望，否则僵到最後，一哄而散，那才精彩。故任何老皮大人必须有官在手，前面不是提过明末皇帝朱由检先生乎，别看他凶暴起，恶气冲天，一旦李自成先生进了北京，他阁下没猴子玩啦，再不能给人官做啦，大家立刻就表演「众叛亲离」，以致他亲自敲钟召集百官，都没人理。历史上对该现象十分浩叹，其实没啥可浩叹的，怎样聚，怎样散，没有把他绑起来献给新老板已算高级文化矣。

韩非子曰：「王者与师处，霸者与友处，亡国之君，与奴隶处。」开创大局的领袖，尊敬他任用的人，像周武王姬发先生对姜子牙先生，尊之为尚父；像齐桓公姜小白先生对管仲先生，尊之为仲父；像汉昭烈帝刘备先生对诸葛亮先生，甚至表示把政权都愿让给。他其次则把他用的人当作朋友，这例子多如牛毛，刘邦先生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，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关系；苻坚先生和王猛先生，一见倾心，成为至友；李世民先生的左右手，也都情若兄弟。可是，「亡国之君，与奴隶处。」呜呼，创业之世，用人唯才，年长者成了老师，年轻者成了朋友。等到政权稳定，进入守成，用人便不管才不才啦，只瞧瞧资格如何，这就开始发僵。等到末世，天下大乱，用人安全第一，就只有子孙圈矣，子孙圈中人都是靠聪明而被赏饭吃，而不是靠智慧换

饭吃的，老板大人左一看焉，一堆谄媚的脸，颂他天纵英明；右一看焉，一群举业的脸，颂他不同凡响。他怎能不飘飘然而晕晕忽，偶尔操操妈，罚罚跪，自理所当然。

买西瓜学

作者：柏扬

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，在於他并不否定聪明，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，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。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，才能装恰到好处的好处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，跟猪一样，有啥可取的？如果他的聪明成份不够，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，也不会有啥前途。於是一切二抓学问，从此而。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，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，可以给你官做啦，有一天，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，并面授机宜曰：「你出得大门，往南走，约二里处，一瓜摊在焉，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，一块钱一斤，快去快回。」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後，心中不禁笑曰：「这个混蛋老头，往南走叁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。」

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，心里笑归笑，你的嘴脸必须严肃的表示对柏杨先生敬如神明。

然後出了大门，头也不扭，迳往南而去，一面赴一面骂曰：「这一带都是无主乱坟，西瓜在何方？哼，狗屎倒不少。」走了足足一个小时，[你如果有雅兴的话，去找妓女小姐风流一个小时亦可，]然後垂头丧气回来，[注意「垂头丧气」四字，精华在此。]见了柏杨先生，立刻面色苍白，气喘如牛，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，结巴曰：「南边没有卖西瓜的呀，我找了一小时，腿都跑断啦。」柏杨先生大怒曰：「混蛋。」你曰：「是是是。」柏杨先生仍大怒曰：「王八旦。」你曰：「是是是。」这时候你阁下脖子上最好适时的流出点汗水，以示恐慌，双膝最好再努力发一点抖，以示紧张。柏杨先生瞧在眼里，龙心满意，乃曰：「你往北找了没？」曰：「没，没有。」柏杨先生曰：「为什麼不找？」你曰：「你老人家没，没，没教我往北呀。」柏杨先生乃跳高而开台湾之省骂曰：「干你娘，简直是猪，存心把朕气死，你还有资格作官？锦衣卫，拿了。」於是你诚惶诚恐，如丧考妣。

写到这里，性急的朋友一定沉不住气，瞪眼曰：「你既教人头也不扭，又教人垂头丧气，弄得如此结果，真是麻子不叫麻子，叫坑人也。」其实妙就妙在这里，盖观察二抓牌有没有前途，不能从他被踢不被踢上看，须从他有没有圈圈上看。这不是说圈里人便永不会被踢，圈里人搞得太恶形恶状，照漾会被免职让位，但与圈外人不同的是，圈外人一旦被踢，那是真正的被踢，想再爬起来恐怕是难难难难难难难。而圈里人便不然矣，被踢固然被踢，但过了几时，等到主愤平息，照漾有得官做。明白这个原则，柏杨先生虽教锦衣卫把你阁下「拿了」，尽管放心，第二天，我的龙心一想：「咦，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，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，最忠贞可靠。」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，你就有得混也。